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契丹语研究

A STUDY ON THE KHITAN LANGUAGE

——孙伯君 聂鸿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H211.5
S902

契丹语研究

A STUDY ON THE KHITAN LANGUAGE

孙伯君 聂鸿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丹语研究 / 孙伯君, 聂鸿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209 - 4

I. 契… II. ①孙…②聂… III. 契丹语 - 研究 IV. H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81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桉 树

责任校对 修广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研究背景	(1)
一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	(10)
二 契丹语的族属问题	(14)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标音原则	(21)
第三节 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	(36)
第二章 词语汇考	(44)
A	(44)
B	(51)
C	(54)
D	(58)
G	(62)
H	(65)
J	(72)
K	(73)
L	(75)
M	(78)
N	(83)
P	(91)
Q	(95)
S	(96)
T	(104)
W	(111)

2 契丹语研究

X	(116)
Y	(118)
Z	(123)
第三章 语音系统	(126)
第一节 辅音	(126)
第二节 元音	(131)
第三节 与契丹小字解读所得辅音系统的比较	(133)
第四章 契丹语词缀	(146)
一 后缀“堇”*-gin 或“隐”*-yin	(146)
二 后缀“本”*-bun	(156)
三 后缀“离”*-ri	(158)
第五章 契丹语的历史地位	(160)
附录	(167)
一 契丹语对音汉字索引	(167)
二 契丹语词语汇考索引	(209)
参考文献	(214)

第一章

导 论

这项研究试图从宋元史籍中收集用汉字音译的契丹词语，并通过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对比来确定其实际读音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辽代契丹语的音位系统和简单的语法规则，目的是为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研究 and 契丹文字的解读提供参考资料。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研究背景

契丹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始于东部鲜卑的字文部，最初分布在古称松漠的地区，即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及老哈河流域。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契丹首领摆脱突厥的控制降唐，二十年后唐设立松漠都督府，正式把契丹纳入了版图。当时的契丹分为八部，据《辽史·地理志》载：

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五代会要·契丹》：

其八族长皆号曰大人，称刺史，内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

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被国人尊为天皇王，916年建元神册，建都西楼邑，国号大辽。辽朝先后与五代、北宋对峙，极盛时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和流沙，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北至外兴安岭，设置五京六府，属国六十。辽共历九帝，即太祖耶律阿保机（916—926）、太宗耶律德光（927—947）、世宗耶律阮（947—951）、穆宗耶律璟（951—969）、景宗耶律贤（969—982）、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天祚帝耶律延禧（1101—1125），延祚200余年。辽保大四年（1124），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被金将娄室所俘，辽朝灭亡。同年，辽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部西去，1134年在起儿漫（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称帝，以八剌沙衮为都城，改元“康国”，史称西辽。西辽1211年被乃蛮王屈出律所灭，帝嗣遂绝。

契丹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在建国之初为了去俗朴、备礼文，威服海内，还先后创制了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辽神册五年（920），是太祖阿保机命突吕不和鲁不古仿照俗体汉字（隶书）创制的，^①属于表意系统的文字，契丹小字是在大字颁行后不久由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的，^②属于表音系统的文字。契丹的语言和文字在当时可能流传很广，^③甚至在辽王朝覆灭后还由金朝的契丹人使用了一段时间，^④

① 《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卷75《耶律铎臻传》：“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多。”卷76《耶律鲁不古传》：“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② 《辽史》卷64《皇子表》：“迭剌，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逐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③ 《辽史》有多处关于高丽遣使学契丹语的记载，如卷115《高丽国记》：“圣宗统和十三年十一月，〔高丽〕遣使册治为王，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卷13《圣宗本纪四》：“〔统和十四年三月〕庚戌，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④ 《金史》卷4《熙宗纪》：“天眷元年（1138）九月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据卷9《章宗纪》载，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金朝国史院才罢专写契丹字者。

不过随后很快便消亡了，在元代修《辽史》时即已不传。^①《辽史》卷69《部族表》：

辽接五代，汉地远近，载诸简册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树艺五谷，衣服车马礼文，制度文为，土产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号，得其音而未得其字。历代踵讹，难于考索。

契丹语文重新得到世人的认识是19世纪末。当时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来到中国，他们与在华传教士和国内学者一道掀起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浪潮，在此期间，学者们在辨别西夏、女真、契丹三种文字碑铭文献的过程中，也积极汇集遗存的契丹文碑铭资料，并展开了针对文字的考证和释读。^②1922年，埋藏着辽圣宗、兴宗和道宗及其皇后的辽庆陵被当地（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东北瓦林茫哈）土豪掘开，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汉名梅岭蕊）获知此事，赶赴当地，获得汉字和契丹字石碣各两方，并逐字摹录。据凯尔温记述：

此四石碣皆卧置于地上，别有一厚石，大与相伴，刻饰精美，覆于其上。下石之边置有古钱若干枚，俾与上层分隔，钱文为清宁、大康等年号。抄录既竣，仍将原碣置于原处而以土掩之。

凯尔温的摹本最初发表在1923年的《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上，^③后来

① 据《湛然居士文集》卷8载，耶律楚材曾用契丹字翻译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在翻译之前曾跟西辽李世昌学习契丹文，曰：“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这大概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契丹字行用的最后记录。

② 此前，学界对契丹文并非一无所知。大家知道，女真文研究始于刘师陆，1829年刘师陆撰作《女直字碑考》，误认乾陵无字碑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契丹小字为女真大字，因而误推《女真进士题名碑》为女真小字碑，揭开了国内研究女真文的序幕。在修正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块碑实为契丹小字碑，从而也重新了解到辽代曾经创制的契丹大、小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陆《女直字碑考》也揭开了报道契丹文献的序幕。国外对契丹文献的报道也与国内类似，女真文献研究始于英国人伟烈（A. Wylie）《古代女真文石刻》（“On an Ancient Inscription in the Neuchih Languag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X VII, 1860），此文沿袭了刘师陆的错误，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归于女真文石刻，但毕竟是比较早地向西方学界报道了这块契丹小字碑。

③ L. Kervyn, “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1101) — une découverte intéressante”, *Le Bulletin Cathorique de Pékin*, 118, 1923.

转刊于同年的《通报》。^①此后，契丹文宣懿皇后哀册也在辽庆陵出土，在当时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关契丹文献的搜集和研究也由此在国内外展开。

欧洲的契丹文研究比较侧重文献的报道，相对而言，日本和俄国学者对契丹文献和文字的研究要深入得多。19世纪初，日本在报道和汇集契丹碑铭文献上成绩突出，鸟居龙藏和岛田好等考古学家和东洋史学家纷纷奔赴辽庆陵遗址，探察和搜集第一手资料，使得契丹文研究在当时的日本学界热闹非凡。最早对契丹碑铭文献进行深度研究的学者是羽田亨，他在1925年撰写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②详尽介绍了契丹碑铭墓志的发现和早期的研究情况，梳理了史籍中有关契丹文字的记载，第一次明确指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所刻不是女真文，而是契丹文；同时还第一次指明《郎君行记》和《道宗哀册》上的契丹文字都是由表辅音与元音的原字组成的表音文字。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契丹文字研究的主流是利用碑铭解读的成果分析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日本村山七郎和长田夏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951年，村山七郎撰作《契丹字解读的方法》，^③尝试用语文学方法归纳契丹小字中的原字，拟定原字的音值。村山七郎的研究不是尽善尽美，如他事先假定契丹原字来自突厥文，从而用突厥文与契丹原字进行对比，这个假定后来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村山七郎毕竟将契丹小字的研究带入了实质性的音值分析，使契丹文的研究由此走向了科学发展的道路。长田夏树作《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读村山七郎氏的论文》，^④引用史料反对村山七郎关于契丹原字来自突厥文的观点，他还循着音读的线索，归纳出契丹小字中共有327个原字，并有选择地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原字进行了音值构拟，这项研究代表了那一时期日本学界对契丹小字考证的较高水平。此外，研究契丹文较有影响的日本学者还有山路广

① L. Kervyn, "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des Leao, et les premières inscriptions connues en écriture Kitan", *Toung Pao*, Vol. 22, pp. 292—301. 1923.

② 羽田亨《契丹文字之新资料》，《史林》第10卷第1号，1925年。

③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的方法》，《言语研究》第17—18号，1951年。

④ 长田夏树《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村山七郎氏の論文を讀みて》，《神戸外大论丛》第2卷第4号，1951年。

明、爱宕松男等。山路广明在契丹文方面的成绩见于油印本《契丹语研究》,① 书中对契丹大字的制字方法和契丹小字原字的分析都有独到的见解。爱宕松男撰有《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② 提出契丹文既不是模仿汉字,也不是模仿突厥字,而是一种独创的文字,并认定契丹语等同蒙古语。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研究契丹文较有成绩的是丰田五郎和西田龙雄。丰田五郎对契丹大、小字都有较为系统的研究,60 年代即发表《契丹隶字考》,③ 对碑铭中出现的表示数目、年号、干支的契丹大字做了初步释读。1995 年他还撰写了《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④ 考释了“太师”等官名,并根据契丹小字拟定了音值。研究契丹小字方面的文章有《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⑤ 文中对契丹小字碑铭中出现的有关四季的词语做了系统考证。西田龙雄《契丹文字——及其新开展之解读》⑥ 是有关契丹、西夏、女真、保保等民族文字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文中列举了出土的契丹文碑铭,简单回顾了 20 世纪契丹大、小字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撰写了《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⑦ 提出契丹小字原字是考虑契丹语和汉语的音韵组织而创制的。

俄国契丹小字的研究较为深入,20 世纪 60—70 年代曾经掀起了一个解读契丹文的高潮,代表人物是鲁道夫和斯达里科夫、纳捷列耶夫等。鲁道夫在《契丹文字问题》一文中,⑧ 参照蒙古语推定了十几个契丹小字的

① 参见于宝林《略论〈契丹语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② 爱宕松男《契丹 kitai 文字解读のについ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 7 号,1956 年。

③ 丰田五郎《契丹隶字考——女真文字の源流》,《东洋学报》第 46 卷第 1 号,1963 年。

④ 丰田五郎著,肖爱民译《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载《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出版社,1995 年。

⑤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民族语文》1998 年第 1 期。

⑥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その解读の新展开》(上、下),《言语》卷 10 第 1 号、第 3 号,1981 年。

⑦ 西田龙雄著,沈力译《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⑧ Л. Н. Рудов: “Проблемы кидан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I, 1963.

音值,揭开了俄国这一时期用语言学方法分析契丹小字的序幕。其后,斯达里科夫、纳捷列耶夫等撰作《契丹文字解读的初步报告》,^①总结了俄国这一时期契丹文研究的成果。进入80年代以后,以阿拉波夫、库兹涅科夫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力求深入探讨契丹语的词汇和语法系统,^②标志着俄国契丹语言研究新思路的开始。

国内较早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是柳翼谋,他在1923年发表了《契丹大小字考》,^③不仅通过史籍的记载考证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而且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契丹文字的资料,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国内首位刊布契丹碑铭拓片的学者是卞鸿儒,他在1931年看到庆陵出土哀册后,撰写了《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④文中刊布了《宣懿皇后哀册》的拓片。此后国内遂掀起了契丹文研究的热潮,概有刘振鹭撰《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⑤记载辽庆陵契丹文哀册发掘的最初情况;周肇祥撰《辽庆陵出土文字》,^⑥通过史籍记载考证了庆陵的情况;厉鼎焯作《热河契丹国书碑考》,^⑦首次对《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中的契丹文字做了实质性的考释;王静如撰《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⑧对道宗和宣懿两种哀册上的契丹字进行了释读;罗福成《辽宣懿

① В. С. Стариков, В. М. Наделеяев等:“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Всесоюз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4.

② 例如 М. В. Арапов, “Лекс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текстов мал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Забуты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Э. Кузьмен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 и диалектная база с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8. Э. Кузьменков, “Киданьский язык”,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языки-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языки-Японский язык-Корей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97. 另外还可参考 В. С. Стариков, “Прозайческие и стихотворные тексты мал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XI—XIII”, *Забуты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М. А. Probst, “Словарь киданьской лексики XI—XII вв.”, *Древни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Этн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③ 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第2卷第6期,1923年。

④ 卞鸿儒《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东北丛刊》第14期,1931年,收入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卷6。

⑤ 刘振鹭《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⑥ 周肇祥《辽庆陵出土文字》,《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⑦ 厉鼎焯《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

⑧ 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

皇后哀册释文》,^①对宣懿哀册部分契丹字做了简单的释读。其中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说为契丹字碑铭的释读提供了轨范。1934年,金毓黻所编的《辽陵石刻集录》由奉天图书馆刊行,书中不仅收录了当时发现的契丹文碑铭拓片和抄件,而且汇集了国内外有关契丹文碑铭考释的文章,既是早期契丹文献资料汇编,又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契丹文研究的丰硕成果,被誉为这一时期契丹文研究的一个总结。

国内对契丹大字碑铭的研究始于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②此文虽误指《故太师铭石记》为赝品,却正确地指出其上文字与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小字”不同,而且参照女真文释出了契丹大字“年”。此后的1951年,《萧孝忠墓志》在辽宁锦西孤山出土,上面的文字不同于庆陵哀册契丹文墓志,它的面世又一次为史籍有关辽朝曾经创制另外一种契丹文字的记载提供了实证,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庆陵哀册和西孤山墓志何为大字、何为小字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明确界定了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即西孤山《萧孝忠墓志》上的文字为契丹大字,大字一字多音节,是表意文字;而庆陵哀册上的文字是契丹小字,小字是表音的音素—音节文字。由此,阎万章于1957年撰《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③对其中的年号和数字进行了解读,从而掀开了契丹大字考释的新一页。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契丹大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相继出土,丰富了研究资料。刘凤翥、阎万章等发表了系列文章,对碑铭做了初步考证,考释出一批契丹语词,而且最近刘凤翥等还对所释契丹大字的音值进行了初步拟构。^④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科学研究走上正轨,有关契丹大、小字的探讨全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契丹小字原字的分析、对陆续出土的大、小字碑铭进行考证和释读等。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① 罗福成《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

② 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1942年。

③ 阎万章《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④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刘凤翥《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11期,2001年。

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一批风头正劲的学者如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等汇集在一起，合力攻关，尝试破解契丹文之谜。人们首先从《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入手，比照与契丹字对译的汉文部分的人名、地名，解析出了一批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之后，刘凤翥、于宝林发表了《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①探索从汉语借词入手解读契丹小字墓志中有关职官的语词，拓宽了契丹小字解读的范围。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契丹小字的解读方法也有了大的突破，这种方法可概括为：利用一个契丹小字音译几个发音相同或相近汉字的现象解读契丹小字，利用归纳词干、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解读契丹小字。^②循着这些方法，学者们逐渐把中国的契丹文研究引向了深入。“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成果汇集成《契丹小字研究》，于1985年出版。^③此书不仅重新公布了契丹小字发现以来出土的全部资料，而且对契丹小字研究的轨迹、方法和成果都做了全面的总结，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解读出300多条词语，堪称契丹文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独领风骚的学者是刘凤翥，几乎近二十年新发现的所有契丹文碑铭的考证和释读都有他的一份贡献。除此之外，刘先生还特别注意契丹小字研究方法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总结，撰有《契丹小字解读再探》、^④《契丹小字解读四探》^⑤和《契丹小字解读五探》等。^⑥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开始的这几年，国内契丹贵族墓地屡见挖掘，又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契丹大、小字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契丹文献资料。契丹文字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墓志的刊布和解读而展

①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

② 参看刘凤翥、于宝林、郭晓丹《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③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④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⑤ 《契丹小字解读四探》，第35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1992年。

⑥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995年第2期。

开。^① 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② 这部书不仅对几十年来契丹小字的研究做了系统的总结，汇集了《契丹小字研究》未及收录的新出契丹小字墓志，而且深入探讨了契丹小字原字的拟音，是近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现存契丹小字文献可分为金、石两种。石刻主要是哀册、墓志和碑铭，金文主要为符牌、钱币和印章等。哀册有《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道宗皇帝哀册》、《宣懿皇后哀册》、《皇太叔祖哀册文》；墓志有《萧令公墓志》、《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耶律迪烈墓志铭》、《耶律智先墓志铭》、《耶律奴墓志铭》、《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墓志铭》、《韩迪烈墓志铭》、《许王墓志》、《泽州刺史墓志》、《故耶律氏铭石》、《海棠山出土契丹小字墓志铭》、《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萧仲恭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等；金铭有开城出土铜镜、宝坻镜、完颜通铜镜、寿昌钱，此外还有玉盞盖底铭文等。

契丹大字文献也可分为金、石两种。石刻主要是墓志、碑刻，金文主要为符牌、钱币和印章等。墓志包括《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故太师铭石记》、《萧孝忠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耶律祺墓志》、《永宁郡公主墓志》、《耶律昌允墓志》、《应历碑》等；碑刻有《静安寺碑》、《辽太祖墓碑》、《辽上京残石》两块、《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建昌县出土石棺》等；金文有白塔子铜镜、辽上京出土银币、阿城出土铜牌、巴林右旗铜牌、翁牛特旗出土铜印等。

① 主要文章有：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刘凤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的解读》（中国民族古文字会第5次学术讨论会宣读，1994年）；吕振奎、袁海波《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考古》1992年第8期）；吕振奎《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王未想《契丹小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2期）；唐彩兰、刘凤翥、康立君《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刘凤翥《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等等。

②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年。

一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始于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中的《辽史语解》即全面汇集了《辽史》中用汉字音译的契丹语词，共十卷，分列君名、宫卫、部族、地理、职官、人名、名物等，并尝试用当时的索伦语推求每一项词义，遇到索伦语解不通的，也兼用蒙古语、满洲语释之。在前边的“提要”中纪昀等有一段编纂说明，指明了此项工作的内容和主旨，曰：

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旨，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心，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于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

尽管清人校改“三史”的工作遭到了现代史学界的猛烈抨击，但这些抨击仅仅是因为改动后的词语失去了旧史的原貌，事实上若从语文学角度考虑，我们可以认为，由于负责详校《辽史语解》的德灵额等颇晓蒙古语和满语，所以其中对一部分契丹语词的解释还是可信的，如卷1“哈屯”释为：“蒙古语王妃之称，卷三十二作可敦，皇后称”；卷2“鄂尔多”释为：“满洲语亭也，卷三十一作斡鲁朵”等等。不过，尽管校注者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契丹语去世已远，其汉字记音又很难捉摸，好多语词用索

伦、蒙古、满洲等语言根本无法索解，于是作者不免滥相比附，导致这本书的实际价值不高。如卷3“伊实，唐古特语智慧也，卷一作乙室。”“乙室”为契丹官名，此处用藏语 *yeshes* “智慧”相比附，显然不确；再如卷10“孟古，蒙古语银也，卷三十一作女古。”把“女古”与蒙古语相联系，解释为“银”，而《辽史·国语解》明确说：“女古，金也。”《辽史》卷31《营卫志》亦曰：“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①

类似的著作还有陈士元的《诸史夷语解义》，此书从历代史籍中纂辑汉字音写少数民族词语，其中也包括从《辽史》中摘录的契丹语官名、地名及常用词语130余则。不过由于陈士元并未对这些词语做任何甄别和考证，使得其中混杂了很多汉语词。

20世纪初，随着契丹大、小字碑铭的不断出土，日本东洋史学界遂掀起了研究契丹语文的高潮，首先对契丹语进行系统考索的是白鸟库吉，他先在1898年汇集了中原史籍中有关契丹文字的记载，向世人勾画了契丹文创制的过程和推行使用的情况，^②然后又于1909—1912年间撰写了《东胡民族考》，^③对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古代东胡民族语言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中有关契丹语部分，汇集了史籍中记载的大部分契丹语常用词凡108则，并用蒙古、女真、达斡尔及通古斯诸语言与这些词语做了详细的比对，考证出了大部分词语的具体词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检验，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考证是站得住脚的，而且白鸟库吉的研究上溯鲜卑，下及蒙古、女真、满语，充分发挥其熟悉东洋学的优势，使得这本书从论证到方法都堪称典范。不过，此书对汉文史籍的征引很不规范，不仅对史书原文缺少核对，而且点读错误很多；另外，其考证尽管旁征博引，尤其罗列了很多通古斯语材料，但也并非每一条考释都站得住脚。

较早留意契丹语并对其进行研究的欧洲学者是伯希和。早在1909年，伯希和就在《中国书目注释》中提醒人们注意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和武

① 契丹语“阿鲁敦”*aldun*，汉意也为“金”，与鲜卑语“阿六敦”(*altun*)、蒙古语 *altan* 相当，但这是一个突厥语借词，而“女古”则是契丹本族语。参看第二章“阿鲁敦”条。

② 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第11号，1898年。

③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原连载于《史学杂志》第21—24编，1909—1912年，又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